

梁启超关于管子研究之述论

梁家贵

(阜阳师范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摘 要:梁启超的管子研究集中体现在《管子传》一书上。他试图通过采用西方近代政治、法律、经济等理论来发掘与阐发管子思想,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开创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有关梁启超撰写《管子传》的起始时间、缘由、内容及其评价等方面,学术界作了一定的探讨,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最后就如何深化包括梁启超管子研究在内的管子研究提出了两点建议。

关键词:梁启超;管子;中西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13)03-0047-04

管子,字仲,名夷吾,我国先秦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多年来,有关管子的研究持续不断,其中清代是一个重要阶段,“清代研究《管子》历朝最多,考证最见功力”,^[1]而梁启超又是该阶段的代表人物,有学者甚至认为“梁启超就是最早以一个政治家兼学者的眼光来看待管子和研究《管子》的”。^[2]据笔者目力所及,学术界有关梁启超管子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故拟就该研究及其研究现状作一简要梳理,并提两点建议,为进一步管子研究、梁启超研究提供参考。

一、研究起始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对管子的研究集中体现在《管子传》一书上。梁氏自称,《管子传》一书,“始于宣统纪元(1909)三月朔,旬有六日成”。^[3]自序然而,梁氏的这句告白似乎并不准确。尽管梁氏是国学大师,但不可能挥笔而就,在没有任何研究基础的前提下用短短十余日就完成了这部书。

1903年2月11日、26日,《新民丛报》第25号、26号在新年大附录征文栏目中连载一篇题为《管子传》的文章。该文作者署名“广东省城卫道街尚同寄庐汤学智”,全文共计11000余字,共6部分,分别为“发端”、“管子之时代及其位置”、“管子之出现及其时齐国之形势”、“管子之爱国心及其返国”、“管子之初政”、“管子之内治”等几部分。这篇文章被不少学者认为是梁氏所作。例如翟建宏认为“梁启超……他于1909年著《管子传》一书,此书前半部分于1903年

2月11日发表于《新民丛报》”。^[2]日本学者森时彦先生则认为该文乃梁氏“自导自演”,“所以,不可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本身就是梁启超为了彰扬实践国民国家的典型管子而自导自演的”。^[4]

王学斌通过对前后《管子传》的对比,以及梁氏曾使用过的笔名、写作动机等方面的分析,认为1903年的《管子传》并非梁氏一人所作,“而是梁同投稿人汤学智的‘合著作品’。这篇《管子传》较之于1909年的《管子传》,无论在篇幅字数,还是思想内容上,皆逊色不少。但它是梁启超将管子纳入其学术视野的肇始,也堪称他管子研究的处女作,更乃之后1909年《管子传》一书的雏形”。^[5]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研究缘由

晚清士人、官员关注管子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挽救民族危机的考虑。他们将《管子》作为救世的良方,渴望从中获取救国救民的东西。薛福成,我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家、散文家、外交家,曾出使四国,认为:“《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旨。”他将西方的政治制度与《管子》的思想作了对比,得出结论:“余观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则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管子》云:‘量民力,则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欺,其民则下欺其上。’西方所设上、下议院,颇得此意。”^[6]所以,他们主张:“居今日而求振兴,惟《管子》一书最切当世之用。”^[7]梁启超生活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其研究管子的缘由也是如此。

乔新华等从史家之责、救亡之志、立宪之愿等三



个方面细致分析了梁氏作《管子传》的心路历程及其背后蕴涵的深意,认为以此可以理解“在清末民初社会大变局的时代,爱国志士以怎样的方式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进行的抗争和探索,及管子思想在那一时期所放射的迷人魅力”。^[8]

不过,梁启超尽管“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9]³⁵⁶但成年后积极参与变法维新活动,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后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大力鼓吹西方文化。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流亡日本,在这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可以说,梁氏早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宣传西方文化和推动维新变法上,并未涉及管子研究。王学斌查阅了自梁氏流亡日本至1903年之间的相关文章,认为这期间“实际上梁对管子的关注并不多,评价也不高,更无专文或大段议论管子的文字出现”。^[5]是什么原因导致梁氏将目光转移到国学上,尤其是管子研究上?

实际上,梁启超开始关注管子研究除与时代背景有密切关联外,还有一个动因,那就是他已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愿望,仅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他曾指出:“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10]管仲所处时代背景与晚清很相似,“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而《管子》一书内容极其丰富,涉及政治、法制、经济、教育、军事以及科技等方面,实用性强,因而引起梁氏的高度重视。到了1918年,梁启超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更加强烈。这一年,他赴欧洲考察,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①然而,梁氏并非陷入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这只不过是他的一贯立场,就是努力将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11]⁷⁻⁸而应该是“淬厉其所

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们的文明,又拿我们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为一种新文明”。^[12]³⁵也正是基于如此考虑,他在研究管子时,采用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方法,企图挖掘其中的精华,实现中西文化融合。

三、研究内容及评价

在梁启超看来,管子乃“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3]同时《管子》一书内容博大精深,很有必要予以研究。在梁氏之前为管仲做传的只有《史记·管晏列传》一篇,因此,梁氏著成《管子传》,被称为“近代中国学术界用新思维研究管子的第一部著作”,^[13]²⁻⁵全书6万余字,共分为13章,除叙论外,分别论及管子的时代及位置、微时及齐国前此之形势、爱国心及其返国、初政、法治主义、官僚政治、官制、内政之条目、教育、经济政策、外交和军政,而“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其他杂事不备载”,尤其“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故论之特详”。王学斌认为,梁启超对管子法治和经济思想进行了全新解读,一方传播了西方新近的政治、经济理论,另一方也开掘了传统政治、经济学说中的宝贵精华,同时,又对《管子》一书的辨伪与考证做了探究。“在梁氏的一番诊释下,管子俨然已成为中国宪政精神之化身与国民经济理论之鼻祖”。^[14]

应该说,学术界有关《管子》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解读、研判了《管子》的学术价值,同时也阐释了梁启超对于管子思想某一个方面的研究。^②但整体而言,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管子传》及其管子研究的评价是褒贬不一的。大多数学者高度评价了梁氏的管子研究。王学斌认为,在晚清民国时期的管子研究领域,学者们各抒己见,其中尤以梁启超开拓甚广,创获亦颇大,“成为后人继续探索的基石”,体现在:一是堪称近代学人融汇中西学术的典

① 梁启超的有关思想,可参见《梁启超游记——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年),以及《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② 例如,汲广林:《〈管子〉道家思想研究》,复旦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尹清忠:《〈管子〉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万英敏:《〈管子〉管理哲学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郭丽:《〈管子〉文献学研究》,浙江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汤曾:《〈管子〉经济伦理思想》,东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翟建宏:《管子经济思想研究》,郑州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周俊敏:《〈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池万兴:《〈管子〉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如:司徒:《〈管子〉礼学思想研究》,河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齐国强:《〈管子〉教育思想研究》,兰州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张晓华:《〈管子〉天道思想研究》,河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匡媛:《〈管子〉人才思想管窥》,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郭天成:《试论〈管子〉农家思想的文学表述》,广西民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吴振晖:《试论〈管子〉的立法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江苏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蒋琴:《〈管子〉商业伦理思想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黄娇:《〈管子〉经济伦理思想及其意义》,河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李修贵:《〈管子〉历史思想述论》,安徽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耿德良:《〈管子〉生态环境思想研究》,山东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李辉:《〈管子〉市场思想研究》,扬州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邹建平:《〈管子〉政治伦理思想研究》,重庆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张琳琳:《试论〈管子〉行政伦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黑龙江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等。

型,成为一种全新的尝试,预示研究新范式的降临;二是体现出他试图从思想史角度诠释管子的努力;三是将管子写入了法家之谱系,从而在学术界产生了深刻影响。^[14]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了梁启超管子研究的不足。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先生创新之举令人钦佩,深刻分析发人深省,然美中不足的是部分内容似有牵强附会之嫌。”^[13]王学斌也指出了梁启超管子研究存在的缺陷:尽管梁启超大量采用西方近代政治、法律、经济等理论来发掘与阐发管子思想,但此种方式不免失之牵强;借用思想史研究视角,而忽略篇章考证,致使许多观点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体现出过渡性的特点。^[14]

也有学者认为,《管子传》一书“引文几乎占据全文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之多”。而“剩下的就是大发议论了”,梁启超就是用这种夹叙夹议的方法表现其政治倾向性。^[15]因此,有学者认为,“略看一下《管子传》的‘目次’,我们就不难看出它基本违背了梁启超本人的做传宗旨。在‘书’与‘人’之间,他惟‘书’是瞻,目中无‘人’”。因此,梁启超将《管子传》写成了管子学案,大量材料的堆砌淹没了传主的个性。同司马迁点铁成金的几桩轶事比起来,满目的材料却不能将人物写得鲜活、生动,因此“梁启超的传记作品只能‘动人’,却不能够‘留人’”。^[16]^[18]

四、其他研究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管子》的成书时间、作者、主要内容等争议较大,因而吸引很多学者投入到该书的考证与辨伪上。因“前此为管子传者,惟《史记》一篇。然史记别裁之书也,其所叙述,往往不依常格;又以幽愤不得志,常借古人一言一事以寄托其孤怨”。这样的话,梁启超要为管子做传,仅“故徒读《史记·管子》,必不足以见管子之真面目,一欲求真面目,必于《管子》”。^[3]^[2-3]然而《管子》一书存在讹误多、索解难等问题,夙称难读。梁启超就指出:

古书文义奥蹟,领解非易。《管子》一书,传世更少善本,讹夺百出,前此几成废书。明吴郡赵氏据宋本校正千百余条,即今浙江局本是也,然不能句读者,尚往往而有。古今注家益复寥寥。今所传房玄龄注,或云出尹知章,其讹谬穿凿,《黄氏日抄》纠之极多,盖《管子》之难读久矣。^[3]例言

既然如此,就不得不对《管子》这本书加以考证。他说:

《管子》一书,后儒多谓战国时人依托之言,非管子自作。虽然,若《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则史公固称

焉,谓其著书世多有之,是固未尝以为伪也。《管子》书中有记管子卒后事者,且有《管子》解若干篇,其非尽出管子手撰,无可疑者,度其中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人增益。此则《墨子》亦有然,不独《管子》矣!且即非自作,而自彼卒后,齐国遵其政者数百年(亦见《史记》本传)。然则虽当时稷下先生所讨论所记载,其亦必衍《管子·绪论》已耳。吾今故据《管子》以传管子,以今日之人之眼光观察管子,以世界之人之眼光观察管子。^[3]^[2-3]

到了1922年,梁氏认为《管子》,“以思想系统论,其大部分必为战国末叶作品无疑”。^[17]^[18]1926年他又说:“其中一小部分当为春秋末年传说,其大部分则战国至汉初递为增益,一种无系统之类书而已。”^[18]^[20]次年,他在燕京大学讲古书辨伪,每以《管子》为伪书之代表,斥之“为无名氏的丛钞”,“为战国末年著作”。^[19]^[16]据此,有学者认为,梁氏的管子研究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了学术转向,基本上放弃了上述观点,有关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9]也有学者认为,梁启超晚年保留了过去对管仲思想的一些看法,但“已侧重于《管子》一书的辨伪与考证”。^[21]

五、两点建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梁启超的管子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管子研究之研究尚很薄弱。为进一步深化管子研究以及梁启超研究,笔者认为应着重开展以下两项研究工作。

(一)要加强管子的学术史研究

所谓学术史,就是“直面已有(已存在)的哲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科学家、宗教家、文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等的已有的学说和方法系统,并借其文本和成果,通过考镜源流、分源别派,历史地呈现其学术延续的血脉和趋势。这便是中国学术史”。^[22]^[5-6]所谓管子研究的学术史,就是综合条贯地介绍各时期有关管子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阐述其基本脉络及风气流变,论述其历史特征。近年来,管子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不断产生,尤其是一年一度的安徽省颍上管子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更是有力地推动了该领域研究。但是,有关管子研究主要围绕“《管子》在国学中的地位、《管子》的‘礼、法思想’、《管子》的‘孝文化’、《管子》有关边疆、资源与环境等的思想、《管子》有关珍惜人力并重视人才的思想”等领域展开,^[23]较少涉及管子的学术史研究。

李霞的《本世纪以来管子研究简介》一文,将20世纪初至90年代管子研究划分为五个阶段,归纳了

各个阶段不同情形的特点,简要介绍了《管子》研究的学术成就及主要观点,是一项不多见的管子研究学术史方面的成果。^[24]但是,该文内容稍嫌单薄,时间跨度也一再上下延伸。要加强管子的学术史研究,展示其学术成就,梳理其发展脉络,研判其薄弱环节,唯有如此,才能进一步深化包括梁启超管子研究在内的管子研究。

(二)注重管子的现实意义研究

《管子》一书虽历千年仍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晚清士人之所以热衷于管子研究主要基于此。要深化管子研究,就要利用先进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多角度、深层次、全方位地挖掘管子思想的精华,为现实所用,从而使其永葆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梁启超等晚清士人的管子研究明显体现出这一点。他们的管子研究不仅具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与时俱进的精神,而且反映了融合中西先进文化的意识。例如,梁启超就是以西方法治主义、西方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概念等西方社会政治学科方法分析《管子》的法治思想、经济思想、货币理论和税收政策,“而时以东西学说疏通证明之,使学者得融会之意”。^[3]事实上,自晚清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在如何对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一问题上,都有过深刻甚至痛苦的思考,以至于五四时期爆发了激烈的东西文化之争。但是,绝大多数中国士人在一味崇尚西方文化后,都回过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救国之道,经历了一个正如章开沅先生所指出的“从离异开始,以回归终结;离异之中经常有回归,回归之中继续有离异”的动态过程。^[25]显然,融合中西先进文化不啻是一剂发展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良方。

参考文献:

- [1]汲广林.管子道法思想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1.
- [2]翟建宏.管子经济思想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05.
- [3]梁启超.管子传[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八: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 [4][日]森时彦.梁启超的经济思想[M].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5]王学斌.梁启超管子研究之肇端——1903年《管子传》考析[J].鲁东大学学报,2008(6).
- [6][清]薛福成.庸庵随笔[M].邓亦兵,校点.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 [7][清]张佩纶.管子学[M]//张固也·《管子》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2745.
- [8]乔新华,杨婵娟.超时空的对话——简析梁启超作《管子传》的缘由[J].管子学刊,2008(2).
- [9]梁启超.三十自述[M]//梁启超.自由心影录.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
- [10]梁启超.中国之旧史[M]//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98.
- [11]梁启超.新民说[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3]司马琪.十家论管·评梁启超的《管子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14]王学斌.梁启超管子研究述论[J].理论学刊,2011(2).
- [15]李莹莹.从《管晏列传》到《管子传》——司马迁与梁启超传记思想比较研究[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
- [16]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7]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四: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9]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百零四: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0]张固也.《管子》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6.
- [21]刘芳,王学斌.试论民初管子研究之转向——以梁启超、胡适为中心的考察[J].船山学刊,2010(1).
- [22]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23]顾家旺.国学·管子·地方经济——第六届管子学术研讨会综述[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4).
- [24]李霞.本世纪以来管子研究简介[J].哲学动态,1994(3).
- [25]章开沅.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J].历史研究,1987(1).

